



報人之死 我也曾經批判鄧拓

以「五・一六通知」為標誌，四十年前的今天，是「文革發動紀念日」。一天後的五月十七日，鄧拓自殺身亡。鄧拓是誰？需要回答這樣的問題，令人痛心。今天中國大陸，「文革」忽成禁區，傳媒避猶不及。一段時間在「百度」搜索「文革」二字，竟顯示「您輸入的關鍵字可能涉及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內容」字樣。讓我們來紀念死於文革的第一人。鄧拓，中共中央機關報《人民日報》第一任總編輯。從我的視角看，一個報人之死，揭開了文革史第一頁。

報人冒犯了什麼？

文革第一頁，並非底層造反，而是高端發難。毛澤東在一九六五年策動對歷史劇《海瑞罷官》的批判，一九六六年春又對鄧拓的報刊專欄「燕山夜話」和「三家村劄記」（與人合寫）發難，都與他本人闖下大禍、導致千萬人死亡的「大躍進」有關。毛認為《海瑞罷官》是替因批評「大躍進」而被他罷黜的彭德懷翻案。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一日，姚文元發表《評「三家村」》，稱「燕山夜話」和「三家村」是繼《海瑞罷官》後「精心策劃的、有目的的、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」。

鄧拓被拋出後不久，在毛澤東「炮打司令部」的號令下，出現激進的「大民主」。底層群眾對官員的不滿一夜間爆發，「當權派」紛紛被打落下馬。但是今天的人們不應忘記：文革的發動，是從整肅傳媒、迫害報人、剝奪言論自由開始。「自由」被禁，「民主」登場，歷史弔詭如此！

四十年前，誰都可以被「打倒」，惟獨對毛澤東不容有半點異議。鄧拓蒙難，就是因為他冒犯了「今上」。

他的第一度冒犯，在《人民日報》總編輯任上。五十年代中期，毛澤東推行激進的社會主義改造，不同意見被斥為「小腳女人」。看到經濟失衡危險，劉少奇和周恩來佈置起草《要反對保守主義，也要反對急躁冒進》，作為《人民日報》社論。文章經鄧拓修改，送毛澤東。

毛澤東批了三字：「不看了」。

鄧拓左右為難，他將社論字號縮小後發表，卻仍然得罪老羞成怒的毛。一九五七年春，毛要《人民日報》刊登批評黨和政府的尖銳文章（實為「引蛇出洞」），鄧拓執行時消極遲疑，於是再度冒犯。毛在臥房召見《人民日報》全體編委。他身穿睡衣，半躺在沙發上抽煙，幾句話後，便對鄧拓嚴厲指摘，說他是「死人辦報」。

中國傳媒的性質，決定了一批黨報老總的酸楚人生。鄧拓被調離《人民日報》到北京市委。一九六一年，中共在「大躍進」帶來大災難後收縮調整。這年，鄧拓開始撰寫「燕山夜話」。

時值饑殍遍野，正直的共產黨人痛心疾首。然而鄧拓只能談古論今，含蓄批評和「大躍進」相關的風氣：虛驕狂熱、罔顧蒼生。他讚賞「量力力」（《愛護勞動力的學說》）；主張通情達理的「王道」、反對蠻橫逞強的「霸道」（《王道和霸道》）；希望讀書人關心「自然界的風雨和政治上的風

雨」(《事事關心》);主張學鄭板橋,「自作主人、不當奴才」(《鄭板橋和「板橋體」》);還談及列寧對「民粹派」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批評(《磨光了的金幣》);這些隱晦的言論,恰恰就是對毛澤東第三度、也是更嚴重的冒犯。

一九六六年三月,毛澤東點名批鄧拓。左派刀筆聞風而動。五月九日,林傑、滕文生等人發表《鄧拓的〈燕山夜話〉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》,尋章摘句,羅織構陷,指摘鄧拓攻擊毛澤東講「偉大的空話」、「誣衊我們的黨『自食其言』、『不堪信任』」、誣衊大躍進「在事實面前『碰得頭破血流』」。批判鄧拓的狂潮席捲大陸。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,就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「五·一六通知」通過的當日,各報刊載了戚本禹的文章。他說:「鄧拓是一個什麼人?現在已經查明,他是一個叛徒。」

五月十七日深夜,鄧拓一直伏案疾書。後來人們知道,他寫的是申辯信和給妻子兒女的遺書。妻子在清晨發現鄧拓冰冷的身軀倒臥在地,手心,是一條濕透的手絹。

我的一九六六

四十年前此時,我唱剛學會的新歌「拿起筆作刀槍,集中火力打黑幫」,正興參加對鄧拓的「口誅筆伐」。我是杭州一名十三歲中學生,被推為代表,在全校大會演講。我似乎是一氣呵成地寫出那篇批判稿的。記得班主任把我叫到語文教研室,進門時,幾位老師正在傳看我的文章,有人還在興奮地朗讀。回憶當日情境,竟然如同節日。批判鄧拓大會就像文藝演出。我慷慨激昂,抑揚頓挫,不時揮拳高呼口號,滿場應和,聲震屋宇。

四十年後的今天,無可逃避的問題是:當年,我的義憤何來?一個少年,加入殘酷的政治鬥爭,為什麼如此順理成章?

我同意,正因為種種人為遮蔽,文革起源和經過真相遠未探究清晰。有人認為文革的起因是中共最高權力的交接危機;有人切齒於當今的腐敗,相信文革是對抗特權階層的民主運動;有人認為毛澤東破除權威功不可沒(甚至就是思想解放的開山者)。一位學者最近提出「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報復的革命」,這表述讓人耳目一新,又心生惶惑。

毛澤東當然是向對大躍進講真話的人報一箭之仇。但廬山會議,彭德懷對他說「不」,決非因為個人恩怨。鄧拓寫「燕山夜話」,滿紙書生之氣,與強人的威勢完全不成比例。毛澤東一言既出,他只能命赴黃泉,豈有還手的可能。

我當時對鄧拓的「義憤」,全然不是出自切身感受。演講之前,我不曾讀過一篇「燕山夜話」,批判的語句全從姚文元他們和「工農兵先進人物」的批判文章裏抄來。「大躍進」對我們沒有任何好處,相反,我親眼見過饑荒。然而頭腦卻被強大的魔力裹挾。那是在整個少年時代被灌輸的,對毛澤東的不假思索的「熱愛」。那時,緊跟毛主席,是正義、高尚;反之則是邪惡、卑鄙。在小學,我常以會背幾段「毛主席語錄」而有強烈優越感,一九六五年剛進中學,當班長的我就能召開「學習毛主席著作」會議。四十年前此時,廣播、報紙的宣傳,讓我篤信不疑。那些「帽子」和「棍子」,一出現就令我迷。是的,鄧拓的《一個雞蛋的家當》,就是在詛咒我們的國家「完蛋」。他的《專治健忘症》,就是要對我們的黨「狗血淋頭」!那時,偶有青年學生對此存疑,立刻被打

成「小鄧拓」，遭到批鬥。

《冰點》前主編李大同曾總結「文革產生的六個條件」：一、一個超級魅力(Charisma)型領袖的存在；二、強力灌輸的單一意識形態；三、毫無個人空間，強制依附於國家的物質生活來源；四、與世界徹底隔絕的資訊環境；五、對因「不順從」而導致全方位懲治的全民性恐懼；六、無條件忠於毛澤東個人的軍隊系統。

歷史不應被解構成沒有正義也沒有邪惡、沒有兇犯也沒有無辜。文革全面爆發後各色人等的相互鬥爭比比皆是(並不完全等同「相互報復」)。然而歸根結柢，文革是一場「專制為體、民粹為用」的「革命」，是一場假「群眾運動」之名的多數暴政，是基本教義派式的狂熱燃燒和蜂擁而上；億萬人的人權遭到踐踏，是它的終局。

毛澤東煽動造反，卻從未給人民真正的言論自由。那個時代，我完全不懂得，對鄧拓的批判，是恐怖的話語暴力。我更不會懂得，文明社會，不僅不能以任何形式的「腹誹」陷言者於死地，即使對領袖直言相向，也是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。許多年之後，我才對那句名言痛有其感：「我擁護可以反對的政府，我反對必須擁護的制度。」

中國式新聞自由

鄧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第一任《人民日報》總編輯。一個黨媒體高層負責人，以其獨有方式追求自由，絕非不可思議的異數。二〇〇六年，有十三位老人，為《中國青年報》《冰點》周刊的遭遇仗義執言。他們中，有前毛澤東秘書、前《人民日報》總編輯、前中宣部部長、前中宣部新聞局局長、前工人出版社社長、前新華社副社長和新華社著名記者。

這樣的名單，令人震撼。

我曾和《冰點》的李大同和盧躍剛談起，我們這些在「學成」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新聞工作者，先生是誰？大家不約而同說到，手把手教我們採訪、寫作乃至帶領我們投身新聞改革的，多是曾在「反右」和文革中遭受打擊的黨內老報人。

誠如在中共高層不乏胡耀邦、趙紫陽等務實、開明的領袖；在中共宣傳機構和新聞傳媒，良知不泯的領導者，代有其人。他們曾是反對軍閥和國民黨專制的青年學子，高唱「向法西斯蒂開火，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」，在紅旗下衝鋒陷陣。這些曾經熱情追隨毛澤東的人，也是最早體察到毛澤東「嚴重錯誤」和人。這些堅決支持鄧小平否定文革、改革開放的人，也是洞觀體制缺陷，對政治改革滯後憂心忡忡的人。曾幾何時，他們遵命、隱忍、委曲求全，臨深履薄，用盡心血去弱化謬誤，減輕危害，而又為此遭受身心摧殘。耄耋之年，他們一個個挺身而出，為自由民主疾呼！

新聞自由是普世價值，在各國實現的路徑卻不相同。今天中國的新聞自由，有三大精神資源：一是民國報人的自由傳統；一是中共老報人的民主傳統；一是曾親歷文革又叛逆文革的李大同、盧躍剛這群「知青世代」報人在近二十年裏造就的改革傳統。四十年前的鄧拓之死，將中國的制度癥結顯現無遺，留下振聾發聵的警示。四十年後《冰點》事件的震盪，讓人看見文明之不可逆，催生新一輪新聞改革的能量正在湧動。歷史無法刪除。慘痛記憶和無價財富熔鑄在一起，無時無刻不在中國傳媒人身邊。

